



我与山东快书



2014年,作者(右)和高派山东快书传人杨明扬合影



鸳鸯板

□ 刘旭东

在临清大众公园内,矗立着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先生的塑像。高元钧(1916—1993),曾长期在临清工作。作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,临清市于1994年11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

山东快书艺术研讨会暨高元钧大师塑像揭幕仪式。2020年9月,临清市成功创建“山东曲艺之乡”,山东快书已成为临清曲艺的一块金字招牌。

山东快书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其定义就是用山东话快快乐乐地说书。其艺术特点是,以说唱为主,语言节奏性强,基本句式为“二、二、三”的七字句(为保证演唱的明快,一般句子最后为三个字)。左手持两块半月形铜板(鸳鸯板)作为伴奏乐器,没绳没线,拿在一块儿。山东快书都是站唱形式,表演上讲究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及“包袱”“扣子”的运用。演员吟诵唱词,间以说白。曲目有单段、长书、书帽等形式。

山东快书由一个或几个演员,用

极简单的道具进行演唱,瞬间就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。由于它不受场地限制,无论田头工地、车站码头、街头巷尾,均可随时演出,切实反映现实生活,所以几百年来经久不衰,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。许多经典段子在群众中广为流传,深受喜爱,最著名的段子就是根据《水浒传》改编创作的《武松传》。

我喜爱山东快书,是从读小学时听一位民间艺人演唱《武松打虎》并帮一位老乡抄写这个段子开始的。后来,我在临清市金郝庄镇文化站工作,尝试写过一篇反映文明出行的山东快书《张八飞车记》,由本乡镇民间艺人甄荣海在当时的临清市东方红影剧院第一次演出,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,也让我深深体验到了山东快书在观众中大受欢迎的程度。受此启发和鼓励,我探访临清的名胜古迹,广泛搜集临清历史名人、特色小吃、非遗项目、风土人情等资料,创作了一篇山东快书《赞临清》,并因此接触了高元钧先生的高足、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会长孙镇业。孙镇业会长对我这篇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,并于2003年12月率6名弟子,专程来临清演出了我创作的这篇快书。演出前,孙镇业会长还在化妆间隙给我题字留念。之后,我又与高元钧先生的弟子杨明扬和高元钧先生之子、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会长高洪胜等快书名家结识。

2010年5月,我参加了首届“包公杯”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。根据基层政府里发生的一件小事,采取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,我创作了山东快书《一张汽车票》,获全国优秀奖,并受邀参加了姜昆先生在包公

的故乡合肥市主持的全国曲艺作品研讨会。那时,我是全国34名获奖的作者中唯一一名来自基层乡镇,也是山东省唯一一名获奖作者。我为自己来自山东快书的发源地临清而深感自豪。

此后,我不断结合临清当地的故事,发挥山东快书文艺轻骑兵的作用,创作了一些新段子。2015年11月,在聊城市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曲艺大赛上,我创作的《临清文化不一般》获最佳创作奖。作为聊城市文联首批签约创作员,2017年5月,我在聊城同心国学院作了题为《曲韵快书,艺谈人生》的专题讲座。

作为临清文艺的主打项目之一,多年来,在临清举办的从地方到国家级的历次演出和赛事中,山东快书是不可或缺的一项。

在山东快书的创作中,我尤其注重表现临清的名人故事,借以宣传临清,促进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建设。比如,我以季羨林先生为新生看行李的故事为蓝本,创作了《北大“守门人”》。该节目入选安徽省百部小型优秀原创戏剧剧本、曲艺作品。我还写了民族英雄张自忠的故事、赵健民在金郝庄抗击日寇的故事……2018年7月,我迎来了创作山东快书的“高光时刻”:在第五届“包公杯”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中,我创作的一篇山东快书《贾局长“拒贿”》获二等奖,除获得两万元创作扶持金外,中国曲艺家协会安排山东快书演员、河南卫视“梨园春”节目金牌主播师亚峰先生对我这个作品进行了展演。这次获奖,极大地增强了我创作山东快书的信心和决心,促使我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,为山东快书增光添彩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红薯窖

□ 翟玉峰

过去,在鲁西农村,几乎家家都有一眼或深或浅、或圆或方的红薯窖。

我家的红薯窖在院内西侧,口小底大腰粗,类似坛子。到底后又分别向东向西掏了两个进深三尺、弯腰可进能放红薯的横洞,这在农村各家的红薯窖中是常见的。这样的设计使红薯窖冬天可存放红薯,使其保鲜不坏。

我家的红薯窖是利用农闲时间挖成的。一开始由父母两个人挖,我们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忙碌,都想上去帮一把却帮不上忙。待挖到齐胸深时就不能用铁锹直接往上扬土了,这时需

要两个人协作配合,即一个人在下边挖土并将挖下的土装进筐中,一个人在上边用绳子将装满土的筐提上来倒到一旁,然后再把筐吊下去。这样,两个筐交替着上下,窖就一点点加深。我村在金堤河北,全是又硬又干且承载力极强的黏性土层,挖起来十分吃力。父亲在下边抡着手镐吃力地挖,然后用短锹把挖下的土装进筐里,筐子装满后挂在母亲吊下的粗麻绳绑着的钩子上,由母亲提上去倒掉。父亲挖累了,他们俩就交换角色,由母亲抡着手镐继续挖。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也参与进来,直到我们都累得挖不动了,便把麻绳缠在腰上打个活结,由

父亲拉上地面。

这样,经过几天的忙活,窖挖得也差不多了。因为当时地下水较浅,一般水井也就是两丈(一丈约合3.33米)多深,而窖是用来存放红薯等食物的,绝对不能挖出水,因此保持在一丈八九深是最合适的。

新窖挖成后不久就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。把收获的红薯装进筐里送到窖口,再用绳索吊到窖里。窖里有人站在正中,接到装满红薯的筐后从脚下开始围着窖壁一圈一圈地往上垛。由于我家的窖带有横洞,容积比一般同等规模的窖大了许多,以致我家收的红薯连半窖都没装满。

那时候,农家冬天、春天主要吃窖藏鲜红薯,夏天、秋天则多为红薯片、红薯面。一窖红薯就是农村人一冬甚至一年四季的主要口粮,储存得好可以有效预防红薯生斑腐烂,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我家的红薯窖由于带横洞,能更好地调节窖内温度与湿度,加上窖口保持通风,储存的红薯很少长斑腐烂。

如今,我们村早已不再大面积种红薯了,但我家的红薯窖留存下来。应该说,在农村还没有普及冰箱前,红薯窖发挥了冰箱的作用,这就是咱们农村人的智慧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